

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一）

2019 年 4 月 12 日-13 日

2019 年 4 月 12-13 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由研究院主办的“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 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以及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共百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主持。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港澳台办常务副主任徐永吉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愿意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支撑；中国要取得更大的发展，需要高校人才关注与研究外部世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高校学科建设也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探索新的知识体系；中国还需要在交流中学习世界经验，在实践中摸索中国特色智库的发展道路。为此，2011 年底，教育部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工作，在 28 所高校设立了 42 个培育基地，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2015 年，教育部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从国家层面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充分阐释了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积极发挥高校作用的必要性，并从制度上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给予保障。2017年，教育部又对395家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进行了备案并给予政策、资金、人员等必要支持。这说明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将得到充分发展。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强调，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在学校层面布局和建设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之一。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着手培养跨学科人才。希望通过此次国际研讨会，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凝聚更多学术共识，收获更多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范式，更多有关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真知灼见。

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文明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Veniamin Popov 首先祝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他表示，此次会议的主题明确地表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和愿景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潜在的地区性和国际性冲突的风险；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合作，能够为双方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要解决这些难题，也需要全世界各国和地区齐心协力，加以应对。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Manuelle Franck 表示，区域

与国别研究是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整理和研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地区及国家的情况。当今世界面临着文化现实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冲击，而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更加全面和多样。与此同时，区域与国别研究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全球不同研究机构对不同领域的问题开展研究。在出现新的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的研究机构，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界来说是个好消息。希望今后有更强大的研究力量，为学者们创造出更多研究机会，提供更多教育服务和智库支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对来自世界各地、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以及其他人类各种各样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以及经济、科学技术所做的综合性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在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中国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了解和理解世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智库功能和对外交流四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研究院将坚持以人才培养为纽带，推动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思路，为世界问题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希望此次研讨会能为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区域国别研究同行提供交流的平台，形成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范式，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体系及相关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进一

步提升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整体水平。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文明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Veniamin Popov 在主旨发言环节首先发言，题目是 *New Balance in the World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Increasing Role of China*。

Popov 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困难转型期，同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性”行动，也给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了困难。有观点认为，如果华盛顿不作出改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向其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可能与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相类似，世界正在走向文明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西方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为敌的结局。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旧欧洲和新欧洲的差异越来越大。西方文明影响力的巅峰已经过去，英国脱欧、苏格兰问题、法国黄背心运动等等都是例证。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的文明快速崛起，而西方强国则在努力维护其对世界的统治权，他们希望利用古罗马分而治之的原则治理世界，但这却导致目前全球种族、宗教、民族基础等方面分化趋势的日益严重。遗憾的是，这种分化仍在加剧。

分化不仅体现在世界经济贫富差距的扩大，还体现在“恐伊斯兰”现象的日趋严重。美国和欧洲对于伊斯兰的敌对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受到了一些政治家的鼓动。目前在非洲、中东地区性冲突不断，同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应该看到，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处理地区问题时仍存在一些问題，这也使得世界处

于新的危险边缘。面对这样的形势，全世界需要共同努力以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怀着善意的人们团结起来比以往更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更多的勇气和耐心迎接挑战。

中国的经验对世界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宝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快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模式和经验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中俄两国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稳定因素，实际上，双方也在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更具可持续性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致力于消除冒险主义和干涉主义，共同维护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以中俄关系为例，阐述了区域和国别研究中的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

冯绍雷指出，冷战终结后全球化深入推进但受到阻碍，当前最重要的现象一方面是多样性高度呈现，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历史推进过程中带有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历史进程和多样性的呈现二者关系会持续多久，又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其次，金融危机使全球化进程受阻，世界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主要大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二是部分地区内部竞争快速提升，由此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只有扎实、严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才能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冯绍雷认为，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中俄关系的意义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上中俄问题对当时国际秩序的含义，

当代中俄关系对国际秩序的多重含义，面向现代化的具有稳固内生性的中俄关系对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对欧亚秩序的历史诠释主要有三种见解，一是以西欧为中心，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向世界扩散的欧亚史观，很长时期内它都是一种主观性的观念。二是以东亚—中国式朝贡体制为核心、强调稳定和谐的区域秩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蒙元帝国的跨欧亚空间治理的国际遗产。

从当代角度看，新世纪中俄关系的含义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从基于一般主权国家的原则，提升到对国家特性的探讨。中俄从两国政治疆界的最终确定，到“好邻居”、“好伙伴”的互利合作模式，再到寻求两国合作的国家建构的基础，类似于新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尝试，即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对方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加以关照，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进行铺垫。其次，两国合作的国家建构的基础是各自的文明形态。俄罗斯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欧亚大国，中国是东方古老的文明中心，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两大文明相互依傍但又和而不同、各具特色，显示出包容、自主、深厚、强劲的历史底蕴。第三，中俄关系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冷战对抗、不同于大国势力范围划分、不同于其他一体化式的区域进程、更不以霸权方式构建国际体制的尝试等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已经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发展水平，建立互信互利的合作方式。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都反映出这一特点。

关于中俄关系对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启示，冯绍雷指出，基辛格曾担忧国际秩序只有一种，但不同文明背景下拥有远

大抱负的国家都希望能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由此产生了困境。冯绍雷表示，英国学者安德森曾提出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可以借鉴维也纳体系，即权力均衡存在道德底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能够“共生”，整个体系更多元、更包容。

综上所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国际长周期正渐渐开始。面对新的变化，决策者不仅需要政策和战略的成熟设计，还需要理论和观念上的全面提升，同时要谨慎地避免战略性、颠覆性的误判。

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院长 Timothy Power 介绍了英美两国拉美研究的起源比较。他回顾了二战后 50 年间美、英两国拉美研究的形成过程，以及拉美研究相关特征的差异与相同的制度特征。

据介绍，牛津大学的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隶属社科学部，此外该校还有各种区域研究中心。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因此需要跨越多个学科，牛津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共涉及 15 个学科。

Power 认为，在区域研究的机制上，尤其是拉美研究上英美存在着一些区别。从理论上讲，历史机制主义强调组织的建立不是由于个人或组织的出现而骤然出现的，而是危机促使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从而导致局势转变，建立组织。在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主要通过关注语言来研究问题，并需要财政上的激励机制。冷战时期受苏联卫星发射成功的刺激，美国国内科学危机感盛行。在科学竞争的背景下，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决定建立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区域研

究，重点关注通用语言，将区域国别研究置于社会科学学科之下。对拉美地区的研究是在古巴革命的刺激下出现的，导致美国陆续出现一系列进行拉美研究的硕士、博士项目。一直以来，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经历着大致相似的发展历程，而在国防教育法案的支持之下，大学之外还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使得区域与国别研究进一步深化。

英国的拉美研究主要关注非殖民化问题，尤其是在加勒比海等地的非殖民化问题，其次也是在古巴革命等重要事件的影响下开始研究一些区域新问题。另外，1963年英国要求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被拒绝，也对英国的区域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述背景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了相关研究中心。英国的拉美研究自身存在一些弱点，比如英国政府更偏爱英联邦国家，所以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度不够，导致区域研究的嵌入型较弱。而从研究规模和研究人员数量上来说，英国的拉美研究也不如美国，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对拉美研究的关注不够持续。此外，欧盟对相关区域研究的影响，以及不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导致了英国在拉美研究上的落后。

Power 认为，区域研究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会受现实的影响。区域自身的重要性会对研究产生影响，例如中东等地区形势的变化会造成相关研究重点的变动。总之，区域研究的脆弱性值得大家重视，即便存在经济衰退或不景气的情况，也要对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进行保护，机制建设对于区域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的发言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

李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欧洲，伴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活动。殖民者希望了解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于是出现了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的出现便是这方面的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镇转移到美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知识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区域与国别研究逐渐带有更多全球化的色彩。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另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得不愈来愈关注诸多全球化议题，如全球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等。

伴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方法论也有很大变化。二战之前传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文学科方法的研究。这种方法强调以语言为基础，理解区域与国别的历史与文化，至今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最近几十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倾向于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试图以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甚至量化的方法构建分析框架。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区域与国别的研究方法：人文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很长时期，这两种研究方法并不十分和谐，而是彼此的相互批评。

在这种相互批评中，社会科学的批评声音最为响亮。如果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三个主要学科，经济学对区域研究的敌意最强。由于在方法论上高度依赖量化分析和规范性模式研究，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特定区域与

国别的经济研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社会学的情形较为复杂，传统的基于理论和历史分析方法与目前颇为时髦的量化分析方法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态度明显不同，后者倾向于用一套分析模式去观察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将特定的分析模式运用于不同的地域或国家。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和区域与国别研究交织最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以美国为例，在比较政治领域有众多的以区域或国别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但即便如此，一些主流学者也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者们不愿或无法将其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且一般都缺乏量化研究的方法。

区域研究学者当然拒绝社会科学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区域研究作为一门特殊的知识不以任何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其目标是了解多元化的人类生存状况，其意义不仅具有为相关学科贡献案例研究的知识论意义，研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除此之外，区域与国别研究还可以服务于文化交流、商业与国家的对外政策。

李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演绎和归纳逻辑、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因此有必要超越这些争论，探索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文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结合的路径，即韦伯著名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一系列抽象概念，并力图在概念和范畴层面构建因果关系，借助这些因果关系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

一方面，对于具体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经

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贡献。第一，社会科学长期发展出一些概念、框架，可以用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描述、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制度、传统、文化甚至心态。第二，社会科学在长期发展中揭示出一些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者探究特定问题的因果联系提供启迪。第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探索、理论突破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提供研究启迪，帮助区域研究专家凝练问题意识，设定研究议题和研究路径。第四，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论可以帮助区域与国别研究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

但也必须认识到，社会科学方法不可能代替传统的人文式研究。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研究，需要了解对象区域及国家独特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独特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独特的制度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都建立在学术界对此前社会政治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此外，今天研究者所接触到的社会政治理论，更多的是以西方国家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将这种理论应用到非西方国家时，研究者必须考察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研究对象的情形，在多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研究对象的实际。这样一种个案的研究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修正原有理论的内涵，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

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主任 Jamsheed Choksy 的发言题目是 *Area Studie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oksy 表示，古时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伊朗萨珊王朝连接，发展成一个动态的网络系统。作为最早的全球体

系之一，丝绸之路促进了人们之间关于外来生物、货物和知识的传播。如今，丝绸之路正在重组，成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一样，新兴的“一带一路”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问题（它只是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小部分），中国还需克服地区性怀疑，甚至是恐惧和反冲，才能使“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简单地说，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地理边界、种族信仰、思想观念、技术竞争、民族主义等多领域的挑战。

Choksy 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关键点在于“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宏伟愿景，处于规划和决策核心的人们必须具备批判地分析事物来源、区分地方和全球问题，以及评估国内、国际问题多重结果的能力。他们需要具备语言、历史、文化和跨社会技能。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在区域研究的知识领域接受教育，重点是特定的地方和群体，并将其扩展到地区研究，重点是区域的相互联系。

区域研究和教育可以在帮助国家政府部门、官员和公民理解、分析和适当应对国家安全和其他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区域研究实践者通过学习外语、宗教、历史、政治、人类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弥合政治、语言、行为和宗教差异，区域研究可以提供内容和手段来理解看似不同的文化，甚至是其领导人和成员可能设想的不同世界秩序的文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知识的源泉，可以结交盟友、传播影响，甚至侧击敌

人。

Choksy 指出，区域研究是丝绸之路的外交先行和知识体现，还是建立在来自不同民族的知识 and 理解基础上的桥梁。因此，区域研究必须再次成为各国克服未来地区和全球挑战的教育、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语言和文化、社会及其历史的深入了解对于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必要的。

主旨发言后，10 位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Manuelle Franck 在发言中介绍了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展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Franck 表示，区域国别研究从历史上看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这种研究主要受霸权或区域强权所影响，与历史数据相联系。比如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化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南北传统也不同，但大家却始终认为只存在一个“黑非洲”，这与我们认为自身存在着优越性有密切的关系。

东方主义的发展是区域与国别知识形成过程中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地区的知识，不仅仅是欧洲地区的。实际上，地方主义和文化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也息息相关。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对相同问题有不同解读，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超越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的研究中心。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不仅想要解决语言问题，还希望能应对和克服现在面临的一些批评，更好地迎接挑战。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旨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维度的研究，比如对中东、非洲区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除了语言学习，还有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内容的研习。学院成立时只教授 4 种语言，现在已经有包括中文在内的一百多种语言了，涉及一百多种文化。另外，即使世界形势发生快速变化，学院仍希望保持语言的专业性，因此尽管学习某些语言的学生很少，但仍有很多专家授课。学院希望在区域研究领域产出更多先进的知识，并通过整合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进一步提高相关研究的专业性。

目前，学院有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 8000 多名本、硕、博学生，有 300 多名教师，很多教授都来自研究对象国。学院设有中东、亚洲、欧洲、东南亚研究中心，并与 100 多个国家的机构达成了 200 多个教学研究协议。学院致力于在研究中解决文化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持续推动教学和院系之间的合作。比如学院不仅有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还希望将这些研究放在东亚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此外，学院还从不同领域和视角针对冲突、移民、宗教、环境等重要全球性问题开展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还是一些研究联盟的成员，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设立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项目，比如进一步推动阿拉伯语、医学用语等研究的发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挑战，学院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确定不应仅仅取决于政府或机构的资金支持哪些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只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化取向，进一步扩大教授语言的范围，更好地发展区域与

国别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介绍了国关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身是成立于 1964 年的北大国际政治系，重点研究领域是亚非拉民主运动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格来讲，国际政治系建系之初的研究既非严格意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非政治学研究，而是针对某种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运动史都有其特定地域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这些地区产生了历史、文化乃至经济政治的共性，所以这种研究也体现出某些区域研究的特征。1996 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最初是三系三所的结构，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之后国际关系学院又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系和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教学研究以及国际化办学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国际关系学院目前教学和研究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关系、功能性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四大领域。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之前已在苏联、东欧、东亚和东南亚、拉美、美国和西欧等方面有所积累，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目前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已经涵盖世界各大洲及主要国家，涉及区域与国别研究本科课程 18 门，同时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也加入进来，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等。

国关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探索过程。出于历史原因，政治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一直作为学院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此外，学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方法，强调经济基础对国家内外政策决定作用，另一个是日本政治外交史方法，强调政治和外交之间的关系。

在 2008 年完成一项重要课题后，学院认识到区域与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的研究需要加强政治学基础，就像要了解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就必须对水面下的冰山主体有充分了解。相较于国际关系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就是冰山主体。为此，学院建立了比较政治学系以加强学生比较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训练。冷战结束后，主导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调整，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等成为新热点。为此，学院新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强化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唐士其表示，随着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到底更多是一种偏向政治学专业性的学术研究，还是建立在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他最后表示，希望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通过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资源，在提升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整体水平的同时，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探索方面也能够取得一些重大突破。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Andrey Baykov** 的发言聚焦区域研究的俄罗斯路径。

Baykov 表示，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 100 周年，希望通过梳理国际关系研究历史，明确这一学科曾经面临的问题，共同探讨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俄罗斯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曾经只是一种培训外交人员的项目，因此相关的语言教学水平很高，同时还学习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从而构建起了“语言+经济、政治、历史、地理、外交政策”的教学体系。此外，俄罗斯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以区域为基础划分的，比如将中国、日本和蒙古划入亚洲，进行整合研究。除了一些基础课程，俄罗斯一些院校还会开设经济学、现代史、区域冲突、哲学、经济地理学、国际法等多门课程。

成立于 1944 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不仅进行语言教学，还进行国际关系以及相关方法论的教学。学院一直专注于如何进行知识传递与专业整合的工作，而 1991 年之后学院对相关学科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学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即如何实现资金的持续投放。由于学院的运行成本只有 50% 由国家提供，因此在进行学科和教学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就需要寻求一种风险平衡机制。

Baykov 指出，目前一些院校在区域研究的教学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疑惑，比如区域研究是何种学科？为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会经受挫折？区域与国别研究谁来学？谁来教？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何区别，如何制定学习日程？对此他表示，区域研究本身似乎是混乱的，其研究对象也是杂乱的，但区域研究本质上是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研究，过去

它主要关注语言和文化领域，现在则更加关注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也就是说，尽管语言很重要，但相关的理论范式也不容忽视，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范式，即对主要问题产生共识，并制定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区域研究要借鉴国际关系研究，区域研究专家需要观察研究对象国的发展与变化。此外，现在很多学习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生来自研究对象国，他们没有理论能力，因而在本科生的层面上需要尽可能地关注地区、跨地区或者国际性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学生缺乏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相关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是无法做好区域研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发言探讨了欧亚研究的学科构建与方法创新。

孙壮志表示，任何学科发展和成熟都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是研究方式的不断调整。欧亚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传统体系当中被认为是非常年轻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比较广，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当中处于特殊的位置。欧亚研究主要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世界历史等领域，研究对象包括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及中东欧国家。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欧亚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发生了一些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方面，目前俄罗斯欧亚研究还是沿袭过去的研究范式，即区域和国别相结合、综合和专业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文献和实证相结合。不过，这种研究方式存在缺少必要的理论创新、低水平重复的问题。随

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一些人尝试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传统经典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创造更加宽广的研究视角。但由于一些研究对象具有非典型性，加之难以获取完整的数据，这种研究方法很难形成有影响的学派。此外，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受西方理论和西方的研究视角影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支撑，还有一些具有西方研究视角的学者因为不能掌握对象国的语言，无法深入对象国进行全面的 research。

近年来，欧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地区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重点区域，现实的发展对欧亚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通、深、准上下功夫，对地区和国别的了解要通晓，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都要有所涉猎；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剖要深刻，不能表面化；资料的大量占有与实地观察和调研要相互结合。此外，对当前趋势的把握要准确，对风险和机遇要作出非常准确的评估，并能够给出合理的预测。

孙壮志认为，中国特色的欧亚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支撑，应该带有明确的独创性、原创性，有别于西方的包括欧亚国家本身的视角方法。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欧亚研究的学科定位，更好的使欧亚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泰国法政大学副校长 **KittiPrasirtsuk** 的发言题目是 *Area Studies in Thail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ossibl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Prasirtsuk 首先称赞中国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提供了宝贵

经验：当今全球化进程如火如荼，各国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与国别的民族文化特点，以便与他们更好地沟通，推动多样性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对于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大，对中国而言，这更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对世界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中国也将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Prasirtsuk 介绍了泰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现状、前景展望。泰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初基于单一学科，比如语言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等文科系，并没有涉及跨学科研究。1984 年是泰国区域与国别研究跨学科发展的起点，当时在法政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开设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主要是对经济崛起的日本进行深入研究。新旧世纪之交，泰国区域与国别研究进入繁荣期，此时研究以东南亚和日本为主要对象，以大学为前沿阵地。此后法政大学设置了俄罗斯研究，朱拉隆功大学也设立了东南亚、欧洲、韩国等研究方向。

2010 年以来，泰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由于泰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泰国大学招生供大于求，生源数量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加之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化，2015 年开始，很多与中国-东盟研究有关的中心得以建立，如湄公河流域研究中心、东盟研究中心等，吸引到很多学生。

Prasirtsuk 表示，与过去相比，泰国高等院校有了明显发展，得到了更多基金支持和研究关注，建立了许多区域研究中心。但同时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对大学排名的过

度重视造成教师学术压力；泰国的农产品、文化产品持续对外出口，海外投资研究能力不足；还要将“泰风”像“韩风”一样对外推广，在区域研究中获得更多的国际视角。

Prasirtsuk 认为，泰国需要更多从事中国研究的一流专家、学者，他同时鼓励泰国学生在攻读硕士、博士课程时要做泰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泰国本身。此外，“一带一路”也应成为泰国学生的重点研究方向，在这一方面中泰可以建立更多的沟通联系，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将世界更广范围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整合起来。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的发言题目是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East, South and West Asia: Personal Observations* 在发言中，他简要介绍了中国、印度、伊朗三种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经历的现代化历程。

张信刚表示，2000 年前欧亚大陆上已经有了远程交流。东方的中国，中部的印度贵霜和帕提亚帝国，以及西方的罗马四大帝国之间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贸易关系。所以，从古至今东西方就是存在联系的，穿梭于各文化之间的旅行者也屡见不鲜。

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特书写系统和长久文字传统的持续性文明。这种在二十五史中可见的持续性，使得学校的读书郎可以轻松读出四世纪的手书文字。同样由于这种持续性，人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看不到太激烈的演变——诗、赋、词的演变也不例外。然而儒教、道教以及从南亚印度传来的佛教水乳交融，形成了中国的世界观。在香港这个有过一个多世

纪殖民史的城市中，佛教依然是主要的信仰。

印度文明经历过几次不同的形态，但其基础特点是不变的：一个基于宗教的社会经济秩序。古代印度河文明诞生了令人无法全知的古代圣贤；雅利安人的到来使印度普及了吠陀梵语；孔雀王朝带来了第一帝国的崛起以及兴盛的佛教；贵霜和笈多王朝则是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中亚人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崛起，而后欧洲殖民者又控制了印度主权。在两面不同的旗帜之下，印度人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在现在的印度共和国内，被印度民族主义所引领的民主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很多印度学生的言谈举止非常西化、思想也与国际社会接轨，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包办婚姻。因此，印度传统风俗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印度社会分化明显，但当今的印度婚礼普遍比中国婚礼更具本土的传统色彩。

伊朗以及其历史上的波斯是一个充满思想性的帝国。古代波斯帝国的领土边界从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无法在今日伊朗的国境范围得到体现。祆教（拜火教）是产生最早的宗教之一，它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世界影响深远。被罗马帝国并入后，祆教还对基督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救赎”概念的传播。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密特拉广为人知，摩尼教更是流传广泛。七世纪中期，波斯帝国被穆斯林征服，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法律和科学传入波斯。人们今天所称的繁荣的伊斯兰文明，很大程度上是波斯人创造的。

现代化这个词本身容易理解，却很难定义。现代性是指一种生活方式，主要是从公元 1500 年以后通过海运、船只

的远行慢慢由西方传播开来。没有一个人永远是现代的，因为现代性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中国东临大海，印度两面有海，伊朗也与海洋接壤。历史上，三国都更多地担心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对海洋感到放心，因此海军力量都很弱。对它们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加强海洋军事力量。在 20 世纪，尽管采用的模式不同，但它们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政治情况大家都很熟悉，在此不赘述；印度在发展西方选举制度和多党制民主的同时，社会秩序却变化不大，种姓制度残余不少；而在伊朗，宗教仍对政治产生着影响。三国都在寻求现代化，却都不愿接受全盘西化。

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前校长 **Bienvenido F. Nebres** 的发言主题聚焦“应对教育与贫困问题：在菲律宾南部构建和平”。

据介绍，菲律宾南部的岛屿离首都马尼拉较远，且与其他国家共享边境，很多渔民或贸易商因此会穿越边境，这就涉及到安全问题。南部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北部地区如马尼拉已有 300 多年被美国和西班牙殖民的历史，南部地区则完全没有被殖民过。这些地区很多都是穆斯林聚居区，有些国家曾试图控制穆斯林省份，但却从未成功实现殖民。从 20 世纪初开始，基于“公地开垦法”，大量北部移民出于经济考虑来到南部的棉兰老岛居住和工作。目前该地区有两千四百多万的人口，移民数量超过百分之七十。

使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跨境问题：沙巴、印尼都与南部

岛屿有接壤，经常有跨境问题出现，甚至有些家庭本身就是跨越边境的，这就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此外还有恐怖分子渗透的问题，这其中既包括个体行动也有 ISIS 组织。

1989 年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成立，其中央政府位于哥达巴托市。这是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协商的结果。2019 年，摩洛哥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成立，这是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协商结果。由此，摩洛哥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代替了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几个世纪以来，这里都被排挤，成为最贫困的自治区。2005 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支持下，当地启动了学校改进项目，主要目标是解决棉兰老岛地区的衣食住行学的问题，通过摆脱贫穷，解决恐怖主义问题。2013 年，当地开始推行 GK 社区发展运动，致力于解决穷人的住房与孩子在校的餐食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相关项目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近几年来，当地经历了两起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危机，一是 2015 年的马马萨帕诺大屠杀，二是 2017 年的马拉维市围困危机。这些恐怖主义事件震惊了全国。在 2015 马马萨帕诺大屠杀中，44 名菲律宾士兵在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交战中牺牲，军方杀死了“伊斯兰祈祷团”的马来西亚头目马尔万。2017 年马拉维事件中，整个城市毁于一旦，很多家庭惨遭毁灭。但这些悲剧也直接带来了一些启迪和改进，比如雅典耀大学的成立，GK 社区发展运动的开启，足球节的举办等。相关举措加大了大学生与社区儿童青年的交流和互动，为不同人群的孩子创造了交流的机会，使割裂的国家又重新融合在一起。

Nebres 表示，他并不是从学术角度来谈区域研究，但对于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苏拉威、沙巴等地甚至对整个亚洲而言，做好区域研究能够解决很多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对于如何才能实现和平，他认为，一个地区只有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国家形成紧密联系，它才不会被分裂出去，从而实现和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的发言题目是《亚洲季风区可持续发展集成研究》。他表示，目前全球面临很多由污染和资源短缺引起的涉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或科学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不能封闭，需要寻求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支持。为此，研究者需要一种更加应用导向型的国际化研究，实现各方面的跨专业。

朱彤指出，联合国已经明确了在 2030 年要达成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全世界的科学家也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尝试更综合、更国际化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型研究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地球”项目被提出。“未来地球”是一个国际项目，得到了国际可持续发展联盟的支持和各国际组织的协助，并预期在未来建立众多研究中心、研究网络、理论-实践网络等发展形式。

朱彤阐述了研究季风的意义。由于大陆和海洋在一年之中增热和冷却程度不同，在大陆和海洋之间大范围的、风向随季节有规律改变的风，称为季风。季风能够带来降雨量的变化，由此影响粮食的种植进而影响到农业的发展。所谓的季风亚洲区实际就是只受到亚洲季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度季风影响了印度次大陆，东亚季风影响了包括中国东

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季风亚洲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大的重合，该地区人口密度很大，且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很大，空气污染、降雨减少、水能源短缺、农业污染都是这个地区面临的挑战。可以说，季风亚洲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

亚洲季风区可持续发展集成研究（MAIRS）是中国科学家符宗斌提出的概念，认为应将季风亚洲系统视为一个触及社会、气候、生物等各方面的综合问题，旨在研究季风亚洲区域人类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朱彤认为，在此研究领域各方应当展开全球合作，季风区的研究价值需得到重视，应将其视为亚洲区域研究，以提升人类对生物系统的应对能力。

在科学家、民营组织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MAIRS正式成为“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子计划，成立了四个工作组：一是围绕水、能源、食物的供给问题，处理资源管理；二是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对该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希望通过相关研究予以改善；三是针对环境与健康问题，处理已知疾病并致力于减少污染；四是设置建模组，用以地区观测和预测，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基础。可以说，以强大科学研究为基础的MAIRS实际上发挥了智库的功能。希望未来能在社会科学领域拓展更多合作点，共同找到解决方案，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战略智库负责人 Amer Hashmi 以中国深圳特区发展为例，分析了巴基斯坦如何借鉴相关经验实现更快发展。

Hashmi 表示，深圳的发展历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经

验：发展知识经济、鼓励投资、聚集人才等等。巴基斯坦的发展比中国晚了 30 多年，目前才刚刚开始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巴基斯坦愿从多方面借鉴中国经验，实现发展。而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中巴经济走廊就是双方最大的成果之一。

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发展眼光非常长远，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在此前的经济发展中遇到了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很多问题，因此想通过 CPEC 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西方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马歇尔计划的再现。事实上，巴基斯坦和美国曾有数十年的盟友关系，但对巴基斯坦来说，现在看不到任何比和中国的合作更为全面、利于发展的途径。

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不仅包括对基础设施的覆盖，还包括提升工业发展、脱贫等问题。合作是双边的，需要互赢。中国希望通过巴基斯坦进入更多的市场，巴基斯坦有煤炭基础设施和融资的优势，可以为此提供有利条件。良好的制造业、投资与金融市场将是 CPEC 的关键聚焦点。可以说，中巴的合作既是出于地缘政治策略框架的考虑，也是地理经济层面的便利性所致。

政府的推动也是一个积极因素。从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看，21 世纪之后的数十年，亚洲都将是全球发展的重点地区。中国已经意识到要让世界认识到“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再版，并且要向尚未充分了解它的国家重申它的发展主旨。不久之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届时会有更多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对“一带

一路”产生兴趣并与中国开展合作。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过去曾是一个军港。虽然中巴之间也存在军事领域的经济关系，但是作为中巴合作点之一的瓜达尔港，其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而不是军事港口。此外，中巴之间还达成了一系列大坝、铁路联合体的合作意向，双方还在讨论开展石油勘探开发的合作。总的来看，中巴既是地缘政治的合作伙伴也是经济发展的伙伴。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最后发言，题目是《“学术戍边”的理论与实践》。他指出，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的研究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载的学术责任和职能担当。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特色日益凸显为周边区域史研究的情况下，在环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已明显步入扑朔迷离状态的新时期，发挥学术工作的戍边作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

韩东育表示，或许因该话题容易给人造成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觉，因此需要同时讨论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畛域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指倡导和支持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而开展更广泛经济政治合作的跨境指导原则。这无疑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和大同理想的最美好目标，所以曾几何时，一批以解放全人类为天职的志士仁人，脱却民族，不要国籍，甚至取消了家庭和亲情为之奋斗。在两场拯救各国和民族命运的世界大战背后，“知识分子”所起的护国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有一种观点不一定对，即民族主义（这里主要指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发生要早于民族本身。但也许相反，人们对家

园的守护甚至为之献身的冲动，缘于世居某地者对该地或父母之邦的天然情感和深沉的爱。在中国东周时期，知识人对家国的保卫几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子贡为抵御齐国挺身而出的行动，之所以能立收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功效，也只是因为孔子一句并不抽象的话：“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它便于人们理解，何以东汉的班超要“投笔从戎”、唐朝会出现像高适、岑参、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等一大批边塞诗人，以及南宋朱熹在为人类贡献出天人宇宙论图示的同时，一定要通过《通鉴纲目》等学术利器来整顿“华夷秩序”，去“收拾旧山河”。近代以来，潜藏于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政治，曾一度使中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遭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沈垚、张穆、龚自珍等知识人通过融接中西国际法理的学术工作，纷纷投身于边疆事务，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并上疏安西北策，视新疆为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横被倭祸，割地赔款，“四万万人齐下泪，举国何处是神州”的巨大悲情曾被康有为列举为以下事件：“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踈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他和千千万万举子们不顾个人前途甚至身家安危而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在唤起中国人近代化改革意识的同时，复将新学新政的导入视为解决内忧外患和边疆主权问题的首要选项，并为后来的“五族

共和”与“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立下了首功。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有关中朝边境的间岛交涉问题。1907年，宋教仁到东三省，意外地发现了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他于是发挥其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6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学术戍边工作，却并未成为日后中国涉外纠纷时可供效法的恒例。

综上所述，首先，中国自古形成的“一”的观念，在国疆既有的“大一统”事实面前，早已凝结为不须讨论的哲学。中国的国家意志表明，“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中国自古已然的“协和万邦”理念即今天所谓“国际主义”传统，仍适合于当下的国际事务而远未过时。这意味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学术戍边工作，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研究者的长期任务和光荣使命。

大会发言后，与会嘉宾还与现场的国内外学者及听众就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对话和讨论，与会代表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各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了不同解答和经验。